



姚依林百夕谈

姚 锦 编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姚依林百夕谈

姚 锦 编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姚依林百夕谈/姚锦编著.-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8.12

ISBN 7-5044-3811-1

I. 姚… II. 姚… III. ①姚依林-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697 号

责任编辑:刘树林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6.5印张 137千字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15.00元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姚依林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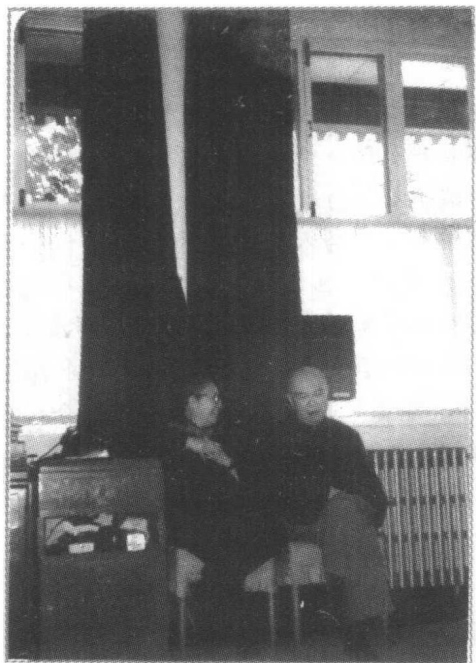
前 言

本稿系姚依林同志口述其平生经历，由其离休的堂妹、业余作家姚锦记录整理，历时两年完成。在这部 12 万余字的回忆录里，依林审慎、简约、生动、“浓缩”地讲述了他一生中经历的重大事件，对于读者来说，许多都是难得的历史珍闻。例如“一二·九”运动，人们都知道是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但出自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姚依林之口，其情景就更加具体而确凿了。再如华北抗战前夕，地下环境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态势及复杂的上层统战工作；敌后民用和军需工业的艰难起步……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传其真。作者还用了三分之一篇幅讲述他经历的新中国的经济改造和建设，自建国初期至“文革”，在“左”的指导思想干扰下走过的艰辛曲折之路，以及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做出的杰出贡献。回忆录提供的不仅是历史见证，更是留给后人品味的一部“温故知新”的宝贵遗产。

依林曾对编著者说，他的回忆录可在他去世后发表。为纪念“一二·九”运动 60 周年及依林同志逝世 1 周年，《传记文学》在 1995 年下半年分期全文发表此作，听到各方面的反应是良好的。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回忆者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是负责的。虽然任何个人都难免有自己的局限性，但作为见证人的口述历史，对于修史者和后代的读者仍有其存在的价值。

《传记文学》原主编 作家 涂光群
1998 年 10 月



1984年，依林与姚锦百夕长谈

有一则短文叙说当年周总理要求过了60岁的老同志要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教后代，作为对国家的贡献。这是为纪念程砚秋逝世在政协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我读后，立即把它剪下来寄给六兄姚依林。

周总理说：“程派唱腔难学。”对程砚秋生前未能多收几个徒弟深感遗憾。我对六兄说，以他的生活经历、长期革命实践经验，六兄的“唱腔”当更难学，也该把自己的经验好好地总结一下传教后代吧！至少我们的子侄辈对他的革命经

历应有充分了解。

近几年来，我很想有机会听六兄自己讲一讲他的生平，而他一无时间，二无此心情。今年我离休后，驻足反顾，更想了解一下在姚姓这个封建官僚大家族中，如何产生了革命的火种；被我们公认为我家革命火种的六兄是如何把自己燃烧，最终锻炼成一个为人民需要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历经50来年的政治生活，他又如何从惊涛骇浪中走过来，有何见闻观感可告示后辈呢？……如对此不了解清楚，将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尽管六兄以67岁高龄还并不想回忆过去，而我的59岁“余热”却一再地把他纠缠，今天我们终于开始了百夕谈。

——姚锦 1984年4月初写的题记

1984年4月1日

我端详着他的容颜：方额大脸，眉目疏朗，虽较“文革”前苍老，但眼底笑痕依旧，精神分外矍铄。那惯于沉思的目光，和善微翘的嘴角，神态镇静自若，显出非凡的毅力。他一向不讲究穿着，总见他在家穿着陈年旧衣，足下一双轻便的圆口布鞋，现在换上了一双旅游鞋。三中全会后，特别是近两年党中央制定的各方面政策在落实和推行中已见成效，革新之举大刀阔斧，体制改革大势所趋，人民生活日有好转，精神生活舒畅开放，我想他此时的心情应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他微笑着，头句话对我说：“我怎么能和程砚秋先生比呢，他是一代大师。”

“很谦虚。”我说，“这样，先谈一谈参加革命50年中，你最难忘的斗争生活是哪一段吧！”

“49年，还不到50年。”他立即认真地更正我。

“好认真！”

“当然，不能多虚报一年。”

“那，是哪一段呢？”

他想了想，说道：“最难忘的还是‘一二·九运动’的一段。”

“为什么？”

“那时候一切从亲自参加的群众斗争实践中来。”他眼望前方，缓缓地说，“一切办法都是和大家一起从斗争中得来的，是真正切合实际、有创造性的。”

“那，后来的斗争生活就不是切合实际、有创造性的？”

我当然领会他并非此意，只是想激他多说几句。他说话言简意赅，习惯于有问则答。

“后来大部分时间做机关工作，方针政策有安排，照办就是。了解下情更多的是看文件，听汇报。”

“不是时常出去调查吗？不是还去‘私访’过吗？”

“当然有调查。都是不如亲身参加的好！下到基层，省里、县里、区里的领导都跟着下去，这样也就难以听得周全、贴切。‘私访’是很难办的！我有一次，以后谈。”

据我所知，他十四五岁时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那时正是1931年日寇侵占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他在抗日爱国运动的激励中，在当时参加了“共产国际互济会”的同学刘艺生的影响下，对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劣政深怀不满，已感觉到有一个不同于黑暗腐败的中国现状的另一理想世界，他寻觅、探索，愿舍身奋斗，循此前进。那时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论》、《反杜林论》，以及一些时而遭查封、时而改名复刊的进步刊物，并热情地走上街头，和上海青年们一起参加抗日示威游行。他18岁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在那儿逐步地卷入革命激流之中，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主将之一。他历经复杂的斗争，至今却更加怀念着青年时代那与群众脉搏相通、苦乐与共、认真求实、群策群力的斗争生活，感情是真挚的。

六兄谈起十四五岁时的革命热情，他的眉目舒展的笑容显得很天真。他说起有一位当年身为国民党中央银行副总裁夫人的姨母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有意见，她认为日本侵略中

国是因为日本人厉害，而不是因为国民党蒋介石不抵抗。他对姨母的话听不入耳，竟和姨母大吵了一顿。小辈的“失礼”，使自视甚高的姨母非常生气。

“那时你住在姨母家吗？”我问。

“不是。”他微笑着对我慢条斯理地说，“你四爸姚捷熏^①号曰继枝，1917年他去世时我3个月，出生在香港。他死后，你四妈蔡亦民带着锦新五姐和我投奔了二爸。二爸姚凌，号曰绍枝，他们兄弟都是因爷爷叫宝枝得名。二爸是当年江苏武进县县知事，死前在上海文史馆任职，他抚养我们到我5岁。你四妈是浙江吴兴人。思想比较开通。擅长英语，在洋学堂任教。她不愿儿女在武进县上学，把我们带到上海读书。你四爸在民国初年是广东海南岛琼崖水上警察厅厅长，死后下葬到江西南昌。因为爷爷原是清朝江西巡抚的一等幕府，好比今天的一级秘书，所以江西有祖坟。下葬费用是二爸、五爸、还有你的爸爸老六几个兄弟集资办理。你四爸去世后有3000银元抚恤金，四妈拿到这笔钱没有动用，在杭州买了一栋房子出租，用租金和她教学的束脩供我和五姐生活、读书。我们的生活是节俭的，我们三口人虽然是姚氏大家族的一支，但并没有在大家庭中共同生活过。”

我想起过去家里珍藏的一张合影，男女老幼几十口人齐着花团锦簇的服饰：妇女们穿斜襟圆下摆短衣，百褶长裙，男人们着长袍马褂。大家排列成行，围绕着端坐当中的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吉装盛服，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我，前排一侧站立着8岁的六兄。这是庆贺奶奶八十寿辰的“全家

^① 姚捷熏，即姚依林同志的父亲，姚锦同志的四爸。

福”留影。

“有一张大合影，不是有你吗？”

“是啊。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家族聚会。当时五爸姚国祯，他号曰幼枝，任交通部部长兼交大校长，又兼烟酒督办。你爸爸姚震，号曰次枝，任司法总长、大理院长。他们两兄弟住在一起，都属安福系段祺瑞幕府，一个要权，一个捞钱，互相勾结。民国 16 年北洋军阀垮台之后，他们才退隐，迁京做了寓公。当年就是五爸用专车把我们母子 3 人从上海接到北平庆贺奶奶八十寿辰。我们在北平东四十条住宅住了 10 天。”

他眯眼笑着，回忆起那 10 天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第一，奶奶八十寿辰那天，我和几兄弟在院子里玩，我折叠了一顶纸帽子戴在头上跑；不但我戴，还教会了几兄弟都戴上纸帽子在院子里跑。结果，挨了十三姑婆一顿骂。我至今记得……第二，当年男人磕过头之后，还要打千儿。你四妈是洋派，准许我磕头，绝对不许我打千儿！第三，当天妇女们都穿着大红百褶裙，惟独你四妈因四爸去世，穿的是粉红裙子，奶奶不知四儿子已去世，便问：‘四太太为什么穿粉红裙子呢？’旁边人告诉她：‘四太太是洋派！’……第四，奶奶问：‘四老爷为何不来庆寿？’告她：‘去海南岛出公差去了。’她又问：‘为什么四太太不跟着去？’有人骗她说：‘四老爷另娶了一个带去了。’……第五，十一条有几进院落，每天我和兄弟姐妹在前院大厅共餐，早餐总有几大盘：千层糕、松花蛋、炸果仁……我们在上海的早餐只有一个面包，从未吃过这样丰盛的早点，给我印象很深。”

陈旧的记忆已成趣闻、奇景、怪现象，这些被历史车轮

碾碎，被时光淘汰的轶事谈资，使我们由衷地大笑起来。

4月19日

我去时，他正伏案工作，一灯独明，满室静寂。他收拾起大书桌上的东西，起身相迎。今天他的面色很好，血压不高。

同去的有女儿元元和侄女欣欣。他们带去小录音机，打算悄悄地录下六兄所谈，却忘记了带电线插销。两人坐下相视而笑。

“笑什么？”六兄见到，便问，“元元高兴，是不是拿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想请我吃肉粥？”

两个姑娘嘻嘻地笑起来。

“啊，录音机。”他发现小录音机，微笑道，“要偷录？”

“六舅紧张吗？”

“紧张什么？”

“那么不偷录，公开地录，可以吗？”

“当然可以，可是有什么可录的？”

他在叙谈之前，告诉我一件事：在“文革”中，说是陈伯达老婆处有一份陈伯达写的什么“一二·九运动提纲”，揪斗他时，便一再要他把“一二·九运动”和陈伯达联系起来。所谓的那份材料却始终未给他看过。根据事实，他不能胡乱去联系，每天便被追问不休。当时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录音机对着他，命令他谈“清楚”这段历史。那时录音机还是新鲜玩艺儿，他说当年对此倒并不紧张。……小录音机唤起了他

的不愉快的回忆，当然，我再也不给他录音了。

他今天谈起 1934 年秋由沪抵京，入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时的几件事。我头一次听说六兄原来是学化学的，他去天津做地下工作时才入工商学院读经济系，也是做为掩护。

“由于到清华大学以后接连地遇见了几件事，”他回忆着说，“才把我这样一个有民主感情，对共产主义有朦胧认识的青年最终推到了革命阵营中去。”

他叙述事情习惯条理化，总是第一、第二地谈下去。

第一件事，新生初入清华大学，满心欢喜，万没想到会遭遇被接待的第一关——“拖尸”。“拖尸”是英文“TOSS”的译音，这是美国高年级学生欺负入学新生的顽皮手段，清华大学的高班生把它照搬过来，年年例行。他去体育馆新生报到处报到，见到高班生在场内围了一圈，命令报到后的新生做各种动作才放行。如不服从，就被几个人架起抛入游泳池中。他报到后被带到场内，命令他用鼻子去顶一个球，这必须趴在地上才办得到，高班生在旁边看了大笑。有几个女同学不愿意做，都被架起抛到游泳池中去了。这件事使他感到受辱。新生异常气愤这种欧美舶来品的恶作剧，议论纷纷，群起反对。于是，他和同学们一起，为此团结起来发表了一个《反 TOSS 宣言》（这个宣言可能是同班同学杨述执笔），在学校里形成了一个“反 TOSS”运动。

接着，在欢迎新生的联欢晚会上，每个班的同学都戴一顶圆顶纸帽。高年级同学戴黄色的、红色的，偏偏让新同学戴“绿帽子”，这也是有意欺负新生。他们抵制戴“绿帽子”，新同学都不去参加迎新晚会。这使高班同学生了气，到处打听新生闹事的带头人，传言夜间袭击，要抓头头扔到

游泳池里去。新生齐心协力，准备好了刀、棍、石灰袋子，摆出“武斗”之势。这一来，高班生才未敢夜犯。当时一年级新生有 300 多人，涌现出一批活动积极分子，从此他们抱成了团儿。

第二件事，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世界语学会，号召同学学习世界语。当时的世界语学会分为两派，一派是绿色世界语，是老派，提出的口号是：“用世界语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另一派则是以清华大学为主的新派：红色世界语派，参加的同学都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提出了新的口号：“用世界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他就是在“红色世界语派”的学习班中结识了当时的北平师范大学同学周小舟，决定了自己的生活道路。

第三件事，1934 年下半年，吴玉章同志在前苏联海参崴教中国工人学习新文字。拉丁化的新文字在当时推广很快，扫盲成效不小，于是在国内教育界兴起了新文字运动。北京以清华大学为中心，因开展新文字运动联系了河北农村许多教师。当年，他在世界语学习班上认识了一个思想进步的邮务员王经方，此人 20 来岁，在清华大学邮局工作。他和王经方两人商议，共同办了一个《北方话新文字》不定期刊物，得到了邮局康局长的支持。他们两人的干劲很大，学校 12 点熄灯后，他们时常点燃蜡烛刻版印刷，一直工作到深夜，有时熬个通宵。他起了一个假名字，叫“王婉莹”女士，于是很多用新文字写来的信寄给“清华园邮局王婉莹女士”收。他们两人便忙着连夜复函，寄去刊物；《北方话新文字》小册子便这样地通过邮局分发出售，广泛地联系、团结了校门以外的有志之士。

第四件事，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在新年休假期间去欧洲旅游，乘西伯利亚火车经前苏联回国。清华大学同学在社联（即社会主义科学工作者联盟，党的外围组织）的领导下，在清华大学组织了一个“现代座谈会”，请冯友兰教授作报告。冯友兰讲了旅欧见闻，也如实地介绍了前苏联的情况。隔日，国民党特务宪兵第三团便来清华大学抓走了冯友兰，说他是共产国际特务，关押到蒋介石的保定行营。但，3天之后，蒋介石下令把冯友兰教授释放了。抗战时期，蒋介石请冯友兰去担任他的“中国哲学史”老师，这是后话；当时冯友兰教授因被扣押非常生气，清华大学同学们也因此事更加认识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

经过了这几件事，他的革命思想在实践中逐步发展，1934年冬天，经周小舟介绍，他参加了革命组织。当时参加的是《毛选》第一卷中提到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乃宋庆龄主办，总会设于沪，各地均有分会，是当年党领导下的许多外围组织中重要的一个。

“且待下回分解吧？”我看他今天谈兴甚浓，怕他过于疲劳，血压又会直线上升，连忙请他就此打住。

两个姑娘已听得全神贯注，静默无声，把所闻录进了心里。

5月4日

今天约谈很有意义，恰好是青年节。他全天国务繁忙，晚上又在看文件；但他一谈起来便专心致志，沉浸在青年时

代斗争生活的追忆中，交谈两个小时，尚无倦意。我感到六兄又回到了风云变幻、风尘仆仆的青年时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能效法欧洲，慑服于挑起大战的威廉二世的权威吧，中国有些父母喜欢为孩子命名为“威廉”。他因出生香港，需用英文名字报户口，小时亦被命名“威廉”。母亲又叫他克广，“克”是大家族兄弟们的排字：克蕃，克文，克新，克明，克和，克广，克安，克祐，克荫，克敬，克治，他排行第六。“广”取意出生地点，也寄托着母亲的希望。入大学后，同学们都不称其名，只呼一声“姚胖子”。据他说参加革命后一直无名，被简称“姚胖子”，去天津工作时曾用假名“许志庸”。直到冀东暴动后，部队发给每个人4元津贴费时要定个名字，他想起上海曾借给他进步书籍阅读的人叫蕙林，就随口给自己定名为依林。



50年代，依林和妈妈合影

我回忆起他被呼为“姚胖子”年代的模样，他时常穿一件肥大的深灰色长袍，显得身材伟岸。他虽胖，却不臃肿，高大又较灵活。当年在天津家中的房顶大露台上，他和我们

弟妹们玩“划拳”，比赛“迈大步”，他总是赢的。我出剪子，他出拳头；我赶紧出巴掌，他又出剪子。玩“迈大步”他几大步就跨到了墙根脚，是常胜将军。在我们的印象里，他那时是一个和蔼可亲、对我们循循善诱，风里来、雨里去，总不得悠闲安静的神秘兄长。

今天他谈起参加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情况。周小舟介绍他和蒋南翔同时加入了这个党的重要外围组织。周小舟当时是四年级学生，他们是二年级学生。

1934年底，时值寒假，周小舟从市内来清华大学找他，给他带来了自卫会的传单——《告同胞书》，要他翻印散发。他会刻蜡版，也会印刷，便立即通过在清华学生会中办事的同学取来了印刷工具，办起来都不难，传单很快印好了。他想了个主意，趁晚间无人时去清华图书馆，悄悄地把《告同胞书》粘贴到每个报纸夹子下边，让报纸把它掩盖，次日同学们去看报时便可发现它。

“那时的心情是，又怕人家知道参加了革命组织；可又想让人家知道自己很革命。”他自我嘲讽地对我笑着说。

当时参加过自卫会活动的，据他所知还有黄诚（“一二·九运动”中入党，后曾任学联主席、党团书记。1942年在上饶集中营牺牲）和吴承明（后去美，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当时与他同屋的同学杨述（后在延安搞青年工作，解放后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1983年病逝）参加了另一个党的外围组织，他们彼此都未说明，两人合办过一个刊物，名《东方既白》。这是本政治刊物。他和杨述都擅长英文，刊物上发表的翻译文章，是两人从《共产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半